

毛泽东同志的家风

毛泽东的家风,有一个醒目的标签:严。教子严,律己严,持家严。毛泽东严格的家风,为人们称颂,值得我们学习。

严以教子

毛泽东对子女品格修为的要求非常高。他教育子女要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看待自己,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对待他人。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相别19年的父亲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开始,毛岸英是和毛泽东住在一起的,但不久,毛泽东就让毛岸英搬到中央机关去住。他还问毛岸英:“你吃什么灶?”毛岸英如实地回答:“中灶。”毛泽东一听便生气地责问毛岸英:“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毛泽东如此“苛刻”,就是要让毛岸英“接地气”,让他明白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能搞特殊。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毛泽东对她疼爱有加,但也一再告诫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搞特殊。上大学后,李讷努力过着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每周六下课才回家。有一次,李讷离校晚,卫士李银桥担心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李讷。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委屈地说:“就是怕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因为从小上干部学校,上了大学的李讷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干部子女的傲气。后来,当她在学习了《庄子·秋水篇》之后,认识到了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毛病,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己对人的态度,要彻底和同学打成一片。于是,她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思想动态。毛泽东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高兴。1963年1月4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鼓励,这让李讷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政治思想,还是在作风品格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进步。

行动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修为和品格。因此,毛泽东教育子女:汝是党之子,革命是汝风,要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北平解放后,首批进入北平的队伍中就有毛岸英。他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承担了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重任。这其实是一项危险系数非常高的工作,但毛泽东却没有阻止,因为他明白:作为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必须要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

也正因为此,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与鼓励下,毛岸英立即就提出要参加志愿军。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说,毛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5位亲人。但是,毛泽东却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来,毛岸英的牺牲,让毛泽东万分悲痛。当彭德怀就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向毛泽东详细作汇报时,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对彭德怀说:“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开怀家国事,不言身与家,就是毛泽东严以教子家风的精准概括。

严以律己

毛泽东严以律己,有着严格的做事原则。在原则面前,他是个明白人,沉淀出了铁骨铮铮见清廉的家风。

“人不以规矩则废”。讲规矩,守纪律,是毛泽东在亲情面前的选择。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这一请求却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了。毛泽东在写给杨开智的回信中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后来,杨开智也领悟了毛泽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的教诲,根据自己的专长,安心留在了湖南的农业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湖南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信件。这封请求入学、工作等照顾的书信转交到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简单的一句“人们会说话的”饱含着毛泽东是“人民的主席”的深情,道出了毛泽东不为“少数亲友谋利”的清廉作风。

毛泽东常常批评教育身边的人,不要因为身份原因,就自以为特殊。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外祖父老家一些姓文的亲戚和朋友,纷纷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可有些人回到老家后,就以为和主席攀上了关系,在乡亲们面前牛气哄哄,甚至以特殊身份自居,不服从管理。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他非常重视,专门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的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

清廉不是亲情之殇,正是因为对家人深深的爱,毛泽东才没有眷顾纯粹的亲情。毛泽东的亲情,不是营私徇亲、沾亲带故的狭隘小爱,而是一种守住公与私分隔线、吃透严与爱辩证法的大爱。他把对家人浓郁的爱化作了严格的要求,用行动告诉他们,奉公守法、遵规守纪是讲亲情义务的基本原则。

严以持家

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在生活中,他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其一生厉行节约,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这方面,他对儿女的言传身教,不仅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铸就了新中国“第一家庭”勤俭节约的风气。勤俭节约,是毛泽东严以持家家风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是个“恋旧”的人,他的生活用品总是能跟随他很久,即使破旧不堪了,他也不允许工作人员随便丢掉。毛泽东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不要多买,以免浪费。对于生活用品,他总是利用得“彻彻底底”,因此,毛泽东的生活账中有很多类似修补热水瓶、换锅底、换皮凉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费记录。

毛泽东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当时江青的工资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另外,江青的姐姐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再加上平时有湖南老家来的亲戚来北京看病,交通食宿、看病的费用,都由毛泽东负担。这些开支经常让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非常为难。后来,李银桥就为毛泽东家制定了一份《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在看了这份计划后,认为每天三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李银桥解释说:“这三块钱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毛泽东听后考虑了半天才同意了这份计划。

在具体的饮食安排上,毛泽东始终奉行简单适合的原则。他很少按照保健医生的安排吃所谓的营养餐。每日三餐,他吃得很普通。只有在生日的时候,毛泽东才会同意多加几个菜,叫上家人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能和父亲一起吃顿饭,算是毛泽东的儿女们享有的“特殊待遇”了。要知道,毛泽东家还有一条规矩,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儿女们与他同桌共餐,儿女们平时都是去机关食堂就餐。当然,毛泽东的生日餐并不算是生日宴会。毛泽东非常反感祝寿送礼这样的不良风气,他常说:“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

毛泽东深知:吾是无产者,勤俭是吾本。所以,他经常告诫子女,学习和事业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根据李敏的回忆,毛泽东经常要求子女们艰苦朴素。解放后,虽然生活好一些了,但毛泽东仍要求他们不要穿得太讲究,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行。在这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做了一件睡衣,而这件普通的睡衣,他却穿了20多年,线开了缝住就行,磨破了补上就好。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缝补了多少次,当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劝他做件新睡衣时,他却说:“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一补再补,这件睡衣上最终落下了73个补丁。这些补丁,体现了毛泽东的家风。



(本版文章摘自《学习时报》)

党的早期历史上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6年12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对照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政治局要继续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成为全党典范,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当前,党的各级组织的民主生活会还在进行之中,这次中央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为全党提供了样板。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党的民主生活会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流于形式,只是走过场;有的庸俗化,成了聊天会;有的溢美化,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而这次中央政治局的率先垂范给全党一个明确的昭示:开好民主生活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为更好地推动召开不走样的民主生活会,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党的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以供参考。

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闇公担任书记,童庸生担任委员和重庆团地委书记。4月重庆党组织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批评会。为什么召开这个会呢?原因就在于此前一位名叫杨洵的干部给中央写信,反映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的问题: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等。中央收到来信后非常重视,适值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杨闇公、童庸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有关负责人便召集他们两人谈话,上来就说:你们重庆党组织怎么分成两派呢?弄得两人一头雾水,直到看了杨洵的信才明白怎么回事。最后

中央决定,让两人回去召开一次会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一致向前进。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干部共10人召开了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会。主持会的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涉及问题的双方只可“赤裸裸地”陈述事实,然后请大家加以批评,弄清问题,达成谅解,以使团体更加统一。杨洵首先发言,一连讲了10个他感到不适不解的问题。接着童庸生一一作答,言谈之中对杨洵的做法深表不满。然后,与会人员分别就事情本身及二人所谈发表了看法。有人指出,这都是童庸生工作不讲方法、对人颐指气使造成的,特别是随意批评同志,有时近似于谩骂;有人说杨洵不愿承担更多的工作,不服从组织安排,显然是不对的;有人说今天童庸生和杨洵的发言都有问题,带着明显的情绪性,好像都是别人的错,如此种种。大家畅所欲言,经过坦诚布公地一番相互批评后,双方当事人都认识到了问题所在:除彼此的误会之外,对于杨洵来说,确实有点摆老资格及选择工作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对于童庸生来说,确实个性倔强,有点自以为是。最后,与会人员达成了思想统一。

会上,非常值得称道的是主持会的杨闇公同志。本来,在情感和工作上他是比较同情童庸生的。两年前与其相识,之后他感到“不觉精神大振,内心的痛苦亦全忘却矣”。而在工作上,杨闇公显然是了解童庸生的,杨洵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不了解实际情况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批评会期间,杨闇公一点也没表现出自己的倾向,而是让大家尽可能地表达各自的观点。最后,他根据大家的发言鲜明地指出了

两人的缺点,一方面强调了团体的统一性,不能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另一方面又提醒任何人都不能把团体个人化,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会后,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加,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

从这次会的前因后果来看,与我们今天的民主生活会是完全相似的。一是会前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就是要解决上下级之间的误会、工作意见分歧、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团体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二是会中“查摆严格,意见坦诚,交流充分”,特别是开展了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杨洵及其他同志对童庸生的批评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三是充分坚持民主集中制。主持会的杨闇公抛开自己的个人倾向,尽情地让大家发表意见,而又不离主题,做到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此后作了画龙点睛的总结,明确了要求,维护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从而做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四是会议的效果良好。“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可以说是民主生活会的一个良好典型。

由此可见,开好民主生活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持团结的重要方法,它对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至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